



李思维：十五年“安静”编大典

■通讯员 曾师斯

2013年年底，湖北教育出版社从华中师范大学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第二次校对稿取走，800万字的书稿需要两个人才能搬下楼。

为了完成大典，他和团队查阅典籍3000多种，引用1990种，复印、摘抄草稿装了五六麻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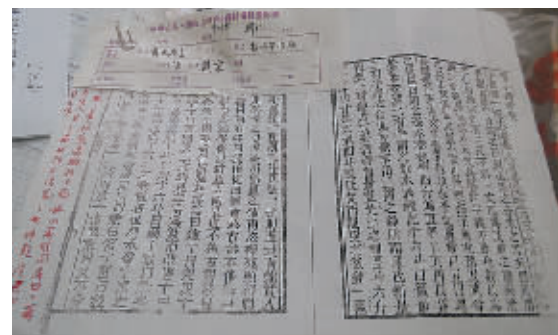
为了完成大典，从1998年到2013年，他和团队泡在工作室5400多个日子，没有寒暑假，没有双休日；

为了完成大典，他夜以继日，不辞劳苦，总感觉头晕头疼，2013年3月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脑瘤，医生切除脑瘤整整用了13个小时。4个月后，他又拄着拐杖走进工作室。

15年前，一句“我接下项目”的承诺；15年后，800万字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即将定稿。这份责任，一直支撑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77岁的李思维教授，“安静”编大典的一群人走进公众视野。



主持编纂《中华大典·训诂分典》、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思维在校园里。 金晶 摄



李思维复印的书稿。



埋首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

从先秦到辛亥，查阅典籍3000种，引用1990种

800万字

《中华大典》是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被称为一部可以和明朝《永乐大典》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该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并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承接的《训诂分典》编纂小组聚集了学校古代汉语研究的实力派教授。除了从事古代汉语研究50年的李思维，还有6位学者在他的召集下加入其中：文学院余斯大教授、陶国梁教授、曹海东教授、王洪涌副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陈蔚松教授、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刘鹤云教授。另外，青年学者李晓辉、安敏等也参与其中。

“项目组中，有的人从中年做到老年，有的人从老年做到去世，”全程参与编纂的曹海东笑称自己做过这个项目，从中年做到了老年。一些老教授把他们毕生的所得所知都倾注在这本大典中。

训诂学是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分支之一，以语义为中心，研究解释历史文献中语言问题的学科。而《训诂分典》编纂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翻看从春秋战国至辛亥革命的古籍，收集在训诂学的发展中，重要学者、论著的相关资料，为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寻找各类评价和解释。

最繁杂复杂的当属资料的收集。古籍浩如烟海，团队需要在众多的典籍中“泡着”，寻找最合适的内容，进而复印整合。编纂这类大典，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实收录原始资料，“自己不能表明观点。”李思维介绍道。在查找资料的实践中，教授们要对材料进行辨别，某句话到底有没有价值，观点有没有重复。

接下项目之后的头两年，编纂小组成员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图书馆，查找典籍资料。他们经常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寻找古籍孤本、稀见的珍本、没有公开出版的稿本，然后复印回来。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晚明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也在他们的搜罗范围之内。李思维说，“有些书只有一本，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在华中师范大学新图书馆建成之前，古籍藏在老图书馆东馆。“一坐就是一整天，连续数月，前后查了3000多种古籍”，李思维想起那段查阅古籍的日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坐在年轻学生的身边，没日没夜地查找文献。

“十几年来，一直习惯看竖排繁体字，现在看到横排的汉字就不舒服。”余斯大介绍说，古籍都是竖排繁体，整个团队最终阅读了3000多册古籍。就这样，大家分头看书，确定大典所需的基本书目。

《中华大典》提供系统的学科史资料，其学术类书的性质决定了编者需要广泛地收集古籍资料。15年前团队的目标是：“竭泽而渔、不漏吞舟。”如今，《训诂分典》的编纂已进入尾声，编纂团队的6位老师都已进入尾声，编纂团队的6位老师都已进入尾声，编纂团队的6位老师都已进入尾声。

如今的《中华大典》是中国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李思维说：“我们这本《训诂分典》能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促进训诂学的研究发展。”

在编纂团队看来，这本《中华大典》是具有学术传承意义的。“训诂学没有系统的体系，只有零散的顾问材料。”团队成员曹海东介绍说，《中华大典》团队就是要按照现代人的学科视野对古文分编，留给后人查阅。

“做得苦。”曹海东这么形容参与项目的这些年。

印象

我辈当引以为典范

■曹海东

自1998年至今，已有15年了。李思维老师这15年只做着一件事情：编修《中华大典·训诂分典》。他在修典过程中的行事作为，看似寻常，实则难能，彰显着可贵的精神品质。以我参与修典而对他的了解，其精神品质有四个方面尤为突出，可用四句话来概括：不弃诚信，敢于担当；不畏艰难，勇于前行；不苟其为人，务于精工；不计名利，甘于奉献。下面略记一些事例，以为诠释。

当年，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一个又一个难题凸显出来：人手短缺，经费不足；资料浩繁零散，搜寻起来如大海捞针；搜集来的文献资料需作校勘和标点，颇费时日；要把杂乱无章的原始材料整合成一部自成体系的新书，非一蹴而就……有这么多超乎想象的困难显露出来，一般人（特别是已退休的老人）可能会选择打退堂鼓，但李思维却选择了迎难而上，一干到底。何以能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事，应该讲究诚信、坚守承诺。他常说：“我当初答应接手这件事，就算是一种承诺，所以不能半途撂挑子，辜负学校的信任。”每次患病住院，他总担心不能完成任务：“我活到这个年纪，对死并不恐惧，只是担心我死了而《分典》没做完，说过的话不能兑现。”其言其情，给人的感觉是，不完成任务、兑现承诺，死也不瞑目。我常想，李思维一次次地被病魔击倒，又一次次地坚强地站起来，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接受的任务就应该把它完成，说过的话就应该把它变为现实！我还想，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所以他能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扑在《分典》上，把修典当作了他晚年生活的全部。

2009年4月，李老师电话联系某高校的一位参编老师，欲催其加快速度，但一直联系不上，很着急，便于某日邀我一起去这所学校。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说我一人前去即可。他说：我也一起去，显得郑重其事。遂与我一道冒雨赶到该校，见了那位老师。大家在编排资料时查考作者的生卒年，颇感繁琐，他便利用工具书等查了近千名古代学者的生卒年，制作了《资料作者排序参考年表》。有了这个年表，大家编排时甚感便捷。

李老师修典，一丝不苟，力求尽善尽美。为了让大家在编纂整理过程中有章可循，他制订了操作规范。他整理的稿子，贴上去的复印件方方正正，写上去的字一笔一画，用红笔打上的标点符号中规中矩，整个稿面干净而清爽。

李老师修典，把名利看得很淡。他常说：“我是退休之人，不想靠编典出什么名。”至于金钱，李老师也看得很淡。他经常自掏腰包买回中性笔、涂改液、回形针等办公用品，分发给大家。我总是过意不去，嘱他以后开发票报销，他却淡然一笑，说：“这些都是便宜货，要不了几个钱。”有几年，学校给每位参编的退休老师发放经济补贴，李老师因为是项目负责人，拿到的钱要比另外两位副高职称的退休老师多一点，他每年就把这多出的部分拿来与这两位老师平分。后来，学校停发了补贴，他还是每天雷打不动到办公室工作，有钱无钱都一样地干。

李老师修典之事可记者甚夥，限于篇幅，择要略述如上。我想，在学术浮躁之风日盛的今天，像李老师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心气平和地做着一件有益于学术进步的事，不计名利、不问得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殊为难得可贵，我辈当引以为典范。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3小时

切除脑部肿瘤用了780分钟 手术后失忆了却没忘大典

李思维出生于1936年12月，1956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古汉语研究与教学，至今已57年。

李思维接受受编《训诂分典》时，已过花甲之年。当时，除了心脏有点毛病外，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所以他有信心临危受命，决定带领大家为国家编纂大典。

起初，李思维没有认识到编纂的难度，认为是把前人的研究分类整理，编纂成书就可以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研究之难度逐渐显现出来。为此，李思维经常向时任《语言文字典》总负责人、著名文献学家、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请教。

2001年4月10日，李思维给朱祖延先生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他把遇到的困难都写在了信上：“我们尽力对材料进行核查，但还有极少量的问题难以解决。首先是有的材料已无法查找。如《小学考》所引曹粹中《放斋诗说》，在《四库全书》编纂时已无传本，仅从《永乐大典》可以看到。但《永乐大典》已毁，如今极少量的残本中仅剩七处引用，根本不见对《尔雅》的论述。”

除了一些典籍无法查找，还有一些典籍核查难度太大。李思维在信中说：“比如《小学考》引有刘肃《大唐新语》一段。我们从几种版本的《大唐新语》中都未查出，而刘肃又无其他著作，一时不清楚此话从何而来。究竟何人所言，只有遍查相关笔记类书籍之后，看能否有个结果。”

再难也不能放弃，再难也要做下去。作为负责人，李思维的压力不仅来自身体劳累，更来自心理和精神。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身心劳累不断吞噬着他的健康。2008年8月，由于头晕头疼厉害，李思维倒了下来。家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庆幸的是抢救及时，危险及时化解，只需要住院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躺在病床上，李思维一直放不下心。他忧虑的是，当《大典》编纂进入关键的收官阶段，自己病倒了，这会严重影响研究的进度。所以，从医院一出来，李思维不顾医生“在家静养”的劝告，又回到了他最牵挂的工作室里，埋头典籍经卷之中。他在工作室的时间更长了，总是老伴打电话叫吃饭了，他才放下手中的工作，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家。

李思维是一名老党员，他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关心国家大事。2011年，《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在当年文学院开展的创先争优党员公开承诺大会上，李思维说出了“除非李思维死了，不然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做大典”的庄重承诺。这是他对学校声誉的坚守，也是对学术的坚守。

越到最后阶段，研究任务越是繁重。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再次吞噬了李思维的健康。2013年3月，他的右脑部位被查出有一个鸭蛋大的肿瘤，最著名的大脑外科专家亲自执刀为李思维做脑部肿瘤切除手术。手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整整做了13个小时，780分钟。

站在手术室外面的家人、同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尤其是在手术中，脑部的一条血管被割破，出血不止，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幸运之神再次降临，除了流血稍多一点，肿瘤成功切除，李思维再次从死神手中逃出来。“老天不让我走，还是想让我把大典完成啊。”李思维感慨地说。

乐观坚强的李思维做完手术后身体恢复很快。半个月后，他就出院在家里休息了。开始吃饭还要家人喂，到了5月，李思维自己可以吃饭了。7月8日，他到医院复查，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一切康复很好。

“别的事情都记不清，只有《中华大典》的各项事务他记得清清楚楚。”肿瘤手术后，医生诊断说李思维大量的记忆会丢失，“但绝对忘不了这刻骨铭心的《中华大典》。”他的老伴伍凤容感地说。

从医院复查回来，李思维在家里只休息了两天，又到工作室里开始了。整个暑假，李思维一直在工作室里加班，做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

“我们不仅完成了这项国家工程，而且培养了一批古汉语研究人才。退休之后，什么都不做，时间还不是一样过去了。我做这个一点也不后悔！”李思维说这15年很辛苦也值得。

王洪涌副教授说：“2002年，我加入了李老师负责主持的大典编纂工作。刚开始，李老师给我的第一和第二批参考书目，都是他工整整抄在稿纸上然后复印的，将近100页，收集的书在2000种左右。我在查找材料的时候，有时候仅仅知道某个人或某部书的名称，我去问李老师，他都会很快地告诉我，哪位学者的书收在某部集子里，有什么版本，可以在哪里查到。记得当时查清人黄模的《国语补书》，李老师告诉我湖北省图书馆有藏书，让我去查。果真在那里就查到这个善本。有时候古文的断句我不太肯定的，拿着稿子去找李老师，他跟我一解释，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

李思维花甲之年编大典，两次大手术住进医院，大家都非常担心他还能不能康复，但他身体稍微恢复之后，又回到了大典的编纂工作中来。现在大典已经收尾了，还有些琐碎的工作需要处理，李思维还在继续忙碌着……

“搞完了，他才能安心。”李思维的老伴说。

从1998年到2013年，泡在工作室里5400多天

15年

1992年，国家全面铺开编纂《中华大典》的项目。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大典湖北工委聘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华中师范大学承接的任务是《训诂分典》的编纂。

或许因为编纂大典工作繁杂复杂，或许因为从未接触过类似项目，不知该从何下手。据介绍，本有文学院两位教授先后接受该项目，不过都因工作量大，编纂难度大不得已放弃了。由此，华中师范大学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

这使得《中华大典》湖北省领导小组找到当时的校长王庆生“摊牌”，“激将法”式地通知学校：如果华师大还不开始该项目，就对外通报“华中师大无力承担《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

“一定要接下去。”时任校长王庆生对学校社科处负责人说。面对这个国家级文献项目，学校当时面临两个选择：接受或是放弃。当时的校领导和文学院教授们均处于为难的境地。

“我接！”原本非编纂组成员的李思维临危受命。谈起这段往事，李思维认真地说：“想着为华师的学人争口气，为华师争口气。”领命之后，李思维立即联系文学院和历史学院老师，组织起纂修班子，研究编纂体例，分属有关事宜，仅仅两年，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稿，且一次通过。

接下任务时，花甲之年的李思维先生已退休。“希望能发挥余热，编纂大典就是为后人做研究提供参考”，先生近50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经历无疑为这部《训诂分典》的编纂增色不少。

于是，在李思维的牵头下，组织起《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

据李思维的老伴伍凤容回忆，项目刚开始阶段，他的头发一年间全白了。当时项目组人手不够且面临资金的短缺，“没有人又没钱”，他只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每天早上很早就从家中出发去工作室，一直忙到晚上。“从早到晚，退休了的老头比正常上班的人还准时、还规矩。”老伴打趣说。

“做项目不要命”，一直以来，李思维对《中华大典》的投入，伍凤容都看在眼里，她明白，李思维就是“犟”，接下任务再难也要完成，“别的人都忙着评职称，都嫌这个项目太麻烦。”伍凤容深知先生的不容易，“所有人都说他该继续搞下去，可他一直坚持。”

这几天，在校报的工作室中，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保暖帽、身体瘦弱的李思维老人坐在工作室的角落，身边堆满了打印好的《训诂分典》的校对稿，只剩下编写引用书目和总的编纂说明的工作。

初冬的下午，满是寒意的校报工作室中，空荡荡得仿佛只有李思维伏案写作所在的角落有一丝温暖。这也许是华师最能坚持的老人，在经历了15年每天的查古籍、归类解释的“苦功夫”后，平淡地说起自己最大的优点：能耐心，能沉下心。在这间得来不易的校报工作室

中，李思维一直坚持编纂大典，一干就是15年。在当年，《中华大典》因工作难度大、对个人发展实际效用低等种种原因，成为没人愿意接下來的“烫手山芋”。如今，却成了李思维无法割舍的事业。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任务是值得被放弃的。“既然接下任务，就没有理由放下来”，这无疑是一段艰辛又幸福的历程，作为《训诂分典》的主编，所有的重担、压力都在他一人身上，但是他的却始终不离不弃，“做了件有益的大事，也算无愧了。”

每天，从东区的家中走到校报编辑部所在旧楼的办公室，早出晚归，没有空调、电脑，只是沉闷闷。一个人安静地在工作室中进行着他的编纂工作。团队中，也只有他是每天准时来到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对资料的裁剪和标注，一个字、一个标点地修改批注。

手边除了用了十几年的红色陶瓷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小烧水壶，就只有一摞一摞的编纂稿，每页复印纸上竖排繁体字的文献上都有他的标记。每张稿纸上都是他一笔一画的文献记录。

除了他伏案写作的一席之地和查阅古籍的资料上，其他的角落都沾满了灰尘。办公室墙角也结上少许蜘蛛网。对他而言，这是间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原来这边是琴房，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现在，《训诂分典》800万字已完成，团队成员正处于校对阶段。预计，今年年初会正式出版。15年的风雨雨，5400多天的坚守，李思维带领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工程最艰巨、编辑出版任务繁重的国家项目。